

(2) 国内经济学对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不多,研究方法及稳健性要求也不够。不过随着研究与教学的国际接轨,科学规范研究方法的普及,以及相关研究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开始注意技术细节。但矫枉可能过正,经济学研究思

想性的要求始终应是第一位的。

随着研究的规范性不断加强,经济学的后期研究比前期研究在研究方法的细致性、稳健性上已大大前进了,这是学术研究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 经济学研究方法之辨

蒋南平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

近些年,经济学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为推进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却出现了严重“重技术、轻思想”的趋向,令人担忧。

### 一、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与作用

研究任何经济理论必须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实际就是在经济学的现象逐渐达到本质的过程中,人们所借助的工具及途径以及借助这些工具及途径的表现形式。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就在于使用这些研究方法去探索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从而解决经济社会的各种矛盾及问题。但是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关于经济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经济学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否是提高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的争论,从1898年美国学者凡勃伦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一文引起广泛的争论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而近些年英国学者马克·布劳格在他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将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之后,更使方法论与经济学的科学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经济理论重技术、重数量的理论认识根源。

实际上,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其提升经济学

科学性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观念,早已有学者强烈地反对。当1938年哈奇森将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时,奈特就强烈反对。他认为“经济行为的各种命题同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有关,它们的含义取决于从事有目的经济活动的人的知识……很显然,从观察行为本身进行推论,我们不会知道人类行为的目的或动机。”<sup>[2]</sup>而奇德威尔认为,一旦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严格应用于经济学方法论中,经济学的生存空间将会非常小。汉兹更认为证伪主义不正确:一是在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大量初始条件和假设简化,这事实上难以做到;二是一些辅助性假设往往以狭隘经验为基础,故而使得在经济学理论中波普尔所要求的条件并不总是存在;三是社会科学存在非社会科学的反馈效应;四是证伪主义在确定度问题上还难以解决。“没有严格检验与似真性之间的联系,方法也就在寻求科学的现实目标上只有有限的价值了。”<sup>[3]</sup>

由于根据证伪主义的观点,科学理论必须在科学解释中是普遍一般化的结论,因此当科学哲学认为必须进行科学解释才能达到科学的目标之后,经济学就理所当然地未能被划为科学之列。如此一来,为了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研究方法的目标或目的自然成为其努力科学化的过程,而技术数理方法理所当然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硬核”。所以,为此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作用似乎也成了强化

技术、精致数理模型、量化、得出结论过程的理所当然的归宿。显然,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作用是依据赞成证伪主义与否的理论基础来划分的,本身就存在认识的分歧。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划分,不仅仅只是赞成证伪主义与否,因为无论是否赞成证伪主义,西方学界对“科学”概念的理解都有特定的含义,与一般的理论有歧义。而我们一般认为“科学”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等的正确认识的理论体系,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运用的目的在于研究经济现象及找寻经济规律,其作用在于搜集、处理、归纳经济现象的信息及资料,演绎、剖析、显露出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即规律。因此,笔者认为技术数理方法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作用,就不能成为经济学的唯一研究方法。

## 二、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

人们早已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并表示出深深的担忧。而这种趋势也受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奇德威尔针对这种数学化趋势,要求以情境分析方法来还原经济学的实践。<sup>[4]</sup>艾克纳也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一系列演绎推理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sup>[5]</sup>我国一些学者更是尖锐地提出,“由于假设条件的严峻,由于违背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从而,微观经济学的结论不能够成立”。<sup>[6]</sup>这些批评,反映出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化、重技术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理论及实践界的一致认可。这些批评,实际上也指出了因重技术、重数理方法而导致经济学思想性缺乏的严重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已使“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经济学研究中重技术、轻思想以致数理化研究趋势在西方愈演愈烈,在中国也是如此。一些学者照搬西方模式,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趋向是向国际接轨的趋向,于是“洋八股”成风并充斥在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学位论文乃至经济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之中。其实,如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家尚对经济学重技术、重数理有不同看

法,为什么国内一些学者还要把数理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中固有的唯一方法呢?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当前经济学研究重数理的趋势并不是自古就存在的。古典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运用数理方法的内容就很少。直到边际学派出现,经济学研究中才大量运用数理方法,但这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运用的唯一方法。甚至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中,绝大部分都不是唯一采用数理方法取得的,即使用数理方法取得的成果,也仅仅是用数理方式表达出丰富的经济学思想或归纳出内涵丰富的经济学结论。而当前西方不少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也不是唯一重视数理方法,更多是采用嫁接法、融合法、综合法。如西方学者拉威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沟通及融合。<sup>[7]</sup>奥哈诺、缪尔达尔及格鲁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融合。<sup>[8]</sup>这种融合的结果,形成诸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一些学者甚至呼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实行大融合,以形成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21世纪的经济学”。

在中国,许多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反对数理化趋势,并不认为数理方法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唯一方法。有的学者研究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两者都不是简单地运用某一种方法,所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绝不是唯一的数理方法。如西方经济学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叙述法”、“对比法”、“假设前提法”、“数理模型法”;<sup>[9]</sup>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体可以分为九大类。<sup>[10]</sup>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体—抽象的研究方法”与“抽象—具体的叙述方法”称为“脱衣法”和“穿衣法”。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种类比西方经济学更丰富;从多角度来揭示规律;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包容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方法。他们还批评西方经济学及当前的经济研究中运用假设前提法及数理模型法是为了使经济理论更为科学的观点,认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在于是否正确

认识客观世界,方法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及途径,它们是否运用正确,不能代表理论的正确性,数理方法也是如此;经济现象纷繁复杂,不同问题的解决只能用不同的方法;而数理方法只是经济研究中众多方法的一种,不能替代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sup>[11]</sup>这些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

### 三、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思想性的关系

如上所述,经济学研究方法被用于两种相反的用途。一是用来表明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用来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按照西方学者关于“科学”内涵的界定,技术或数理方法运用的高深程度是衡量一门学科科学性的程度。因此,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是科学,而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就不是科学,而经济学还不能完全地运用数学,因此“还不是一门科学”。这样一来,在中国,许多学科也不是科学。例如,中国学界就曾有过“中医学是否伪科学”的大争论,而历史上也曾有过“心理学是伪科学”的质疑。但如果将经济学的方法用做揭示经济规律的途径及手段,那么无论用何种方法,包括数理技术方法获得的对某种学科的正确认识,或正确的认识形成的学科,都应该是科学。我们不否定西方学界运用数理技术等所谓“科学方法”形成的科学,但也不能否定不运用数理技术等“非科学方法”形成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认识的科学。试想,为人类造福几千年的医学(西医学、中医学)、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等,由于数理技术运用不多、甚至完全不运用的学科难道还不能是科学吗?如果不是,那么世界上仅仅存在只用数理技术形成的科学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认为,无论是否运用数理技术,只要是通过合理的方法得到正确认识的学科体系,都应该视为科学。我认为为了更加明确“科学”的涵义,应当将运用数理技术这些所谓“科学方法”形成的科学称为“科学方法科学”,不运用或不完全运用数理技术“科学方法”形成的科学称为“非科学方法科学”。

以上述为基础,可以看出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与其科学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科学”不论是否通过科学或非科学的方法获得,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规

律性的正确认识,这种正确认识必然要通过思想表现出来,特别是正确的思想。无论何种方法,都应该反映或促使经济学的思想性的形成。正确使用方法,才可以正确形成科学,否则,只会破坏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的思想性。以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例,他们希望通过为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历史论题提供一个严格及清晰的表达,但他们的分析技术却远离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及理论孤立起来,忽略了分析技术与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sup>[12]</sup>此外,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约翰·罗默等人还运用逻辑分析技术,皈依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消除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联系,全面解构唯物史观,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 & 思想性。<sup>[13]</sup>西方一些学者实际上也反对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其科学思想性割裂开的做法,并针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为“劳动价值概念是和这些关系的数量方面的精确表述完全一致的”。<sup>[13]</sup>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思想性是不矛盾的,是密切相关的。

经济学方法与经济学的思想性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能代替或等同经济学的思想性,可以表达及促成经济学的思想性,但经济学的思想性是由多种经济学方法来表达及促成的。这是因为,其一,经济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思想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经济学的方法是探究经济现象的途径与手段,经济学的思想则是该学科要表达的经济概念、范畴、原则、原理、结论等认识方面的内容。其二,经济学的思想性必须靠一定的方法来促成及表达。例如,通过抽象法,形成经济学的概念;通过数学法、归纳法、推演法等形成经济学的结论;通过逻辑法确立经济学的原则;通过综合法形成经济学的原理等。其三,由于经济现象关系复杂,经济学思想浩如海洋,任何方法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得到运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方法,都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解决特定的经济学问题,形成特定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说丰富的经济学思想,需要多种的经济学方法来形成,而多种经济学方法才能促成或形成丰富的经济学思想。